

共建“一带一路”研究的 三种理论视角

谢来辉

摘要：“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是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是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过去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一带一路”相关问题的理论化研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本文试图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传统，对理解“一带一路”的理论视角进行归纳梳理。研究发现，现有文献中关于“一带一路”理论化的主要路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分别基于财富、国家权力以及社会目的等三个角度来开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虽然认为财富、国家权力和社会目的是学科领域的三个基本要素，但是强调三者之间的关系才是主要研究对象。按照这种理解，未来“一带一路”的理论研究，应该打破现有研究的隔离状态，实现一种理论上的综合与折中。

关键词：一带一路 国际政治经济学 权力 内嵌的自由主义

作者简介：谢来辉，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室执行主任、副研究员。

DOI:10.16845/j.cnki.ccieeqh.2023.04.008

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进一步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基础，为理论化提供学理支持，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一带一路”研究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工作，并且多次提出明确要求。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8 月举行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就曾明确指出，“我们要厘清‘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内涵，把道理说清楚、讲明白。要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重构和延伸、区域合作等角度阐释‘一带一路’建设，突出‘一带一路’建设对加强地区整体振兴方面的积极作用。要结合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从周边外交、南南合作、全球治理等层面深挖‘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内涵，形成一整套的理论成果”。

过去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已经围绕“一带一路”的理论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但是，相关的研究分散在不同的学科，一直缺乏系统的总结和梳理。本文试图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传统，对理解“一带一路”的理论视角进行全面梳理，希望为进一步的理论创新提供基础。

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为“一带一路”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一带一路”作为一种国际合作新模式的重要探索，通过十年来的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发

展的重要实践。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彼得·卡岑斯坦（Peter Katzenstein）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和国家权力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两个基本建构材料。^① 后来，他在与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主编的《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一书中强调，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者一直研究的对象是“权力、财富和社会目标之间的关系”。^② 笔者通过研究发现，现有文献中关于“一带一路”的理论化研究，其实是沿着财富、权力以及社会目的等三个角度分别开展的。

一、共建“一带一路”研究的财富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在新时期提出的国际合作倡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的是基于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实现经济利益拓展的一种经济合作模式。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时就曾强调，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被强调为新时期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一带一路”倡议强调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原则为指导，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和趋势。“一带一路”要实现东西互济、海陆联动，促进西部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③ 要建设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区域合作体系。“一带一路”倡议强调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中国在新时期高举开放和自由贸易的大旗，与一些曾经力主经济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月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被西方媒体认为是中国在新时期捍卫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宣言。

在主要基于经济利益或者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所谓的“财富”视角下，出现了关于“一带一路”的两种重要理论解释，分别基于经济自由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

（一）全球价值链双环流

长期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合作的主要理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认为，理性的个人会在市场的逻辑下追求利益，最终实现社会福利的改善。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贸易、买卖和交换是人类的本性。经济自由主义还认为，经济活动会促进国家的力量与安全，对财富的追求会推动国家之间开展合作，而不是走向冲突。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浪潮也推动经济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主导的理论视角。

在这种理论视角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种关于“一带一路”理论解释的创新性概念框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张辉等（2015、2017）认为，“一带一路”是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并认为其本质是形成了所谓的“全球价值链双环流”。按照这种逻辑，中国企业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成为全球价值链双环流的枢纽，通过中间品和最终消费品的贸易，连接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可以处于国际分工的中心位置（见图1）。

^①[美] 彼得·J. 卡岑斯坦编，陈刚译：《权力与财富之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前言第1页。

^②[美] 彼得·卡岑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秦亚青、苏长和、门洪华、魏玲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4~45页。

^③卢锋、李昕、李双双、姜志宵、张杰平、杨业伟：《为什么是中国？——“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3期，第13、3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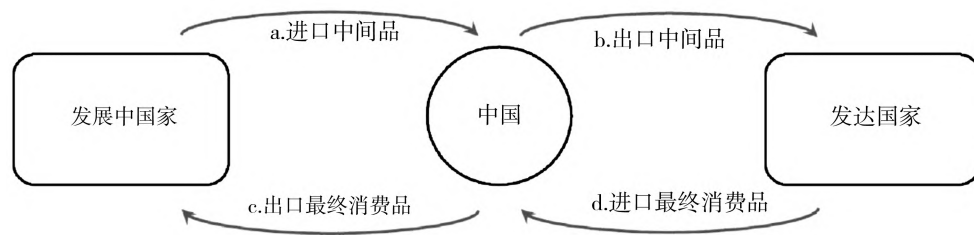


图 1 全球价值双环流模式

资料来源：张辉、易天、唐毓璇，《一带一路：全球价值双环流研究》，《经济科学》，2017 年第 3 期，第 12 页。

类似地，浙江大学的黄先海、余骁（2017）也提出“一带一路”将重塑全球价值链，构建以中国为核心主导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整体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形成双向“嵌套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新体系。在此基础上，南京大学的刘志彪、吴福象（2018）进一步将“一带一路”塑造的国际分工格局称为“共轭环流”。他们认为，“一带一路”可以使得中国实现“双重嵌入”的效果：一方面能够嵌入发达国家的创新价值链，同时又能主导对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通过“双重嵌入”和“抱团嵌入”的互融共建，促进全球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均衡，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的再平衡，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内生化发展，培育制造业集群的动态竞争优势。

全球价值链“双环流”的理论解释在国内经济学界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可，而且也在国际问题研究界得到进一步传播。比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傅梦孜（2018）认为，应该基于三个视角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分别是“超大规模经济的外溢效应”“价值链的延伸与攀升效应”以及“通道的适切性与区位导向”。但是从理论逻辑上看，“一带一路”对于塑造新的价值链和形成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发挥着核心支柱的作用。此外，还有大量的经济研究都侧重分析“一带一路”的福利效应，评估“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国内各地区以及对沿线国家的各种福利影响。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被纳入财富视角的理论类别中。

全球价值双环流的逻辑同时具有一定的实证研究基础和规范涵义，因此在阐释“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但是，近年来这种逻辑正面临着现实的巨大挑战。因为自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已经日益出现本地化和区域化的趋势。特别是随着美西方推行供应链“去中国化”战略，亚洲地区的全球价值链有可能演变为两个平行但又相互联系的区域价值链。^① 这会使得中国企业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并且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双环流”设想，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二）空间修复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思想传统之一，也强调经济利益作为国家行为的主要驱动力。但是与经济自由主义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国际合作的效果有截然不同的理解。

过去几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自身的假设出发，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研究提炼的“空间修复论”，提出了一种理解“一带一路”的新观点。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

^①李向阳：《后疫情时期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与中日经济合作的前景》，《日本学刊》，2021 年第 3 期，第 10 页；[美] 加里·杰里菲等，曹文、李可译：《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发展：理念框架、研究发现和政策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271 页。

vey) 最早提出了“空间修复”的概念。哈维在接受采访时也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拯救世界经济”和“支撑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举措,但是他认为这“基本符合资本继续运作的逻辑”,是他所说的“通过‘空间修复’来吸收过剩生产力的一种尝试”。^① 这种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是受资本主义经济利益驱动的,强调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来解决物质利益方面的需求,包括西部地区的开放以及过剩产能的输出等问题。这种观点得到了不少响应。比如英国学者蒂姆·萨默斯(Tim Summers, 2016)就发表多篇文章,主张“一带一路”并不是国家的一种地缘政治策略,更像是一种基于资本和市场逻辑的“空间修复”。这类文献将其理解为主要或完全是一项资本主义事业,目的是使中国的利益相关者致富,并促进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持续增长。这一重要的经济逻辑被许多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自由主义论点的学者所强调。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经济行为与西方大国的资本输出并没有任何不同,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沿线国家面临的发展环境,与此前的历史经验相比不大可能会有新的变化。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其实既不谋求改变权力结构,也不试图破坏现有规则,而是在现有体系下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比如英国学者李琼斯和曾敬涵(Lee Jones and Zeng Jinhan, 2019)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完全是受中国国内资本利益驱动,它并不是一个连贯的、地缘政治驱动的大战略,相反它是一个非常松散的、尚不确定的方案。

但是,这种观点对于“一带一路”建设能否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前景持有疑问。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的结果持有疑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其结果,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可能会遭受剥削,加强发展不平等的状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国际经济分工秩序会导致后发国家对核心国家的依附,不可能摆脱欠发达状态。

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关系也持悲观态度。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合作协调还是冲突,存在一个“考茨基和列宁之辩”。^② 其中,考茨基(Kautsky)认为,有可能出现一种超级帝国主义,以致国际金融资本联合对世界进行共同开发;但列宁则认为,世界经济存在着一种形成单一托拉斯的大趋势,不同国家的利益会产生交叉和冲突,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因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一带一路”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其中一种可能是中国与全球资本相互交织与融合,以共同开发世界其他地区,世界秩序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另一种可能是世界进入一个寡头的帝国主义阶段,导致国家在利润分配、市场份额和资源安全上的冲突不断加剧。^③

二、共建“一带一路”研究的权力视角

权力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另一个关键对象。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现实主义或经济民族主义思想最为关注权力因素。这种观点认为,国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它优先考虑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不仅追求绝对利益的增长,更在意追求相对利益和权力;在充满国家竞争的背景下,国家围绕权力的争夺本质上是一种零和博弈。

①[美] 戴维·哈维、周宪、何成洲、尹晓煌:《空间转向、空间修复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学术研究》,2016年第8期,第147页。

②[美] 罗伯特·吉尔平,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2~38页。

③[丹麦] 李彤,林宏宇译:《聚焦“一带一路”倡议: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为视角》,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1~54页。

“一带一路”倡议显然也有权力方面的目标。“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定位之一是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一书收录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其中两篇都强调中国应该积极提高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问题。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在题为《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发展壮大自己》的讲话中指出：“只要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虽然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但我国经济大而不强问题依然突出，……我国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依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① 2016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的重要努力。^②

北京大学的黄益平（2015）认为，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受挫的背景下，中国选择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来落实经济外交新战略。其他国内学者（黄河，2015）也明确提出，基础设施等特定公共产品的提供，必然会与经济权力的增长有关。新加坡学者塞莉娜·何（Selina Ho, 2020）指出，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向沿线国家提供优惠贷款和投资，必然会带来经济权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增长，特别是导致增强中国的结构性权力。但是，“一带一路”的“非经济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被官方宣传话语中有意忽视了。“一带一路”倡议在经济外交方面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被有效地建立起来。^③ 国内的学者尽管也明确认识到西方现有的地缘政治理论不适合解释“一带一路”，但是也没有形成新的理论。^④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关于“一带一路”研究的权力视角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现实主义者占据了。在西方国家的很多研究中，“一带一路”的权力视角被简单套用西方传统的地缘政治的话语，目标也被严重扭曲了。英国学者威廉·卡拉汉（William Callahan, 2016a、2016b）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建立类似历史上朝贡体系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崛起的中国将会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某种形式的“新的霸主”。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学者汤姆·米勒（Tom Miller）在2017年的《中国的亚洲梦》一书中指出，“毫无疑问，习主席的使命是让中国回归他所认为的亚洲最大强国的自然、正当和历史地位。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这确实意味着中国必须在自己的后院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经济外交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朝贡体系，所有的道路实际上都通向北京。”

这种以中国为中心（权力为导向）的逻辑，是西方学者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常见误解。显然，根据这样一种逻辑，“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将延续过去不平等不公正的、依附性的国际经济关系，而且也必将会引发与其他大国之间新的地缘政治冲突。比如“一带一路”建设的项目，被西方媒体批评为是政治考虑优先，市场利益服从于政治目标。其中最为极端的观点就是所谓“债务陷阱外交论”。在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赵穗生（Suisheng Zhao, 2020）看来，“一带一路”建设形成的国际经济关系更有可能出现冲突而非和谐，共同发展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依然还有一些学者清醒地指出，中国虽然将因为“一带一路”建设获得影响力的提升，但是“一带一路”并非追求霸权或者替代美国的错误目标，最终的结果也未必会导致大国间的冲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99~102页。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38~140页。

③李向阳：《“一带一路”的研究现状评估》，《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12期，第30页。

④[英]科林·弗林特、张晓通：《“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理论创新》，《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突。比如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马必胜（Mark Beeson, 2018）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确实会导致权力和影响力配置的改变，提高中国的地位，但是最终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仍然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这种影响力的拓展是正常和健康的，而且这并非导向以中国霸权替代美国霸权，而是导向在亚洲乃至全球营造一种更为多极化的秩序。英国学者苏岚（2020）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催生有机性变革以满足中国自身发展的需求。“一带一路”倡议并不会对全球经济体系构成系统性“威胁”。^①类似地，美国学者弗林特·莱弗瑞特和吴冰冰（Flynt Leverett and Bingbing Wu, 2017）认为，通过新丝绸之路倡议，中国可以越来越多地利用自己的能力，通过积极鼓励更大的区域和全球多极化来增强中国的影响力和维护中国的利益。虽然新丝绸之路的成功将极大有利于西方的长期利益，但这也明显增强中国的战略自主权，最终迫使美国的大战略做出实质性的调整。

中国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以共建“一带一路”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已经成为近年来的一个重要的新表述。在这种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服务于国家安全目标的紧迫性似乎日益加强。随着中美关系陷入紧张，特别是七国集团（G7）推出明确要对冲“一带一路”影响力的新倡议，引发与其他大国之间新的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可能会明显上升。这也可能使得西方现实主义或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论视角更有影响力。同时，这也意味着加强在权力视角下对“一带一路”进行理论研究的紧迫性日益加强。

三、共建“一带一路”研究的社会目的视角

社会目的视角强调社会价值观的保护目标，认为市场经济扩张和国家权力应该在相应的规则下运作。英国学者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市场扩张与社会保护的“双重运动”的理论：经济活动是发生在一定社会关系之内，服务于社会目的。资本过分扩张，市场经济的“脱嵌”会导致对社会的破坏。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鲁杰（John Ruggie）基于这个理论，提出了所谓“内嵌的自由主义”概念，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一种同时强调保护社会目的和市场经济的秩序。这种视角很大程度上是与多边主义和全球经济秩序联系在一起的。

前面两种理论视角都是分别只从市场（资本主义）或者国家权力的角度去理解“一带一路”建设，第三种理论视角则强调观念的力量。而且瑞典学者阿斯特里德·诺丁和米歇尔·韦斯曼（Astrid H. M. Nordin and Mikael Weissmann, 2018）认为，与传统理论中把国家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不同，国家和市场（资本主义）的力量可以形成一种合力，而“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为新的多边主义全球经济秩序创造支持性的条件。共建“一带一路”一个重要的定位，是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些理念和价值元素，都是“一带一路”建设推动的经济合作所需要内嵌的社会目标。正是这些内嵌的目标以及新型国际关系，使得“一带一路”建设所依托的愿景，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的治理体系截然不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华盛顿共识”加速瓦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过度脱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比如收入差距扩大、全球环境危机加剧等，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突出问题。

^①[英] 苏岚，魏晓莎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倡议》，《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2期，第101页。

在这种背景下，纠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后果，启动某种“重新嵌入的”再全球化就成为人们的广泛期待。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同时也是引领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习近平主席在 2017 年 1 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向国际社会呼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应对此前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有国内学者（刘卫东，2017a、2017b）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内涵就是引领包容性全球化。这与历史上西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存在很大不同。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期，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把经济全球化看作是客观必然的力量。比如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曾说，全球化相当于一股经济上的自然力量，就像风或水一样。中国看待经济全球化的视角基于自身以及东亚地区崛起的发展经验，特别是基于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成功经验，政府在其中发挥了更大作用，有利于克服经济全球化这个“双刃剑”的负面影响，同时获得更大的收益。正如加拿大学者罗纳德·基思（Ronald C. Keith, 2005）所说，中国认为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自由贸易不再自动与国家主权对立，而且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支持一种关于多边主义和多极化的新的“理想主义”观点。

从理论和历史上看，崛起的大国可能会愿意承担更大的责任，为国际秩序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曾以历史上的美国为例这样说道：“这些领导国所追求的经济目标与其更广泛的政治和安全目标乃至建立国际政治秩序的抱负紧密相连。在这样的机会出现时，这些强国往往以促进某种国际经济秩序为手段，以实现更广泛的政治和战略利益。”^①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衡（Wang Heng, 2020）认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法体现了从被动、选择性地适应外部规则到主动、选择性地重塑国际经济制度和规则的重大转变。不具约束力的“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分别与西方主导的“硬法”路径（如具有严格规则的世界贸易组织、美墨加协定和世界银行等）的运作并行不悖。这可能会支持中国从一个经济大国（Economic Power）转变为一个治理大国（Governance Power）。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必须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这本身就是中国强调的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原则。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建设所需要奉行的理念，包括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正确义利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所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平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西方国家近年来提出的基础设施国际合作倡议，特别是 G7 提出的“重建更好世界”（B3W）倡议和“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PGII），都强调所谓的“价值观导向”作为对冲“一带一路”影响力的措施。其中强调的往往是在经济合作中嵌入西方国家的价值理念，包括西方民主、个人自由至上主义、普世人权标准、透明度和绿色低碳等。从这个意义上看，观念或者价值维度的竞争与合作必将日益突出，使得它必须成为“一带一路”理论构建的重要维度。

四、结 语

基于前面的分析，经梳理和对比关于“一带一路”的三种理论视角的主要特征，可以发现这三个

^①[美] 约瑟夫·格里科、约翰·伊肯伯里，王展鹏译：《国家权力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09 页。

理论视角在理解“一带一路”的三个基本问题（即“一带一路”是什么，为什么要提出，以及怎么建设）方面，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答案。

表1 “一带一路”研究的三种理论视角

理论视角类型	“一带一路”的主体	“一带一路”是什么	为什么要提出“一带一路”	怎么建设“一带一路”
财富视角	企业/次国家行为体	务实的经济合作；顺应经济全球化的选择	形成有利于中国的经济枢纽地位（经济自由主义）；“空间修复”（马克思主义）	市场原则；重塑全球价值链，产业升级
权力视角	国家	构建中国为中心的新秩序（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利益服从政治目标	国家安全，更大的影响力，结构性权力	中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政治主导经济
社会目的视角	国家+市场	重新嵌入的自由主义的多边主义	改善西部地区以及沿线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为新自由主义之后的世界提供替代方案	在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相关理念约束下的全方位合作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到三种理论视角的要素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话语中都存在，这反映出不同的政策目标在产生竞争性的张力。“一带一路”倡议有三个目标：一是推动新时期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二是促进中国经济外交的构建；三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李向阳，2019）。这三个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财富、权力和社会目的三个视角。正因为如此，现有的“一带一路”理论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是分别在各自的空间内独立发展的。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同思想传统各自存在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关系，这本身又在分化人们对相关现象的认识。

这对于理解“一带一路”理论发展的复杂性可能会有一些启示。不同的理论视角只是对应不同要素的理想类型，“一带一路”的实践可能是同时跨越了多种理论视角。比如加拿大学者埃里克·赫莱纳（Eric Helleiner，2019）就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其实是介于经济民族主义和内嵌的自由主义多边主义之间的一种状态。“一带一路”本身的内容非常丰富，在不同的时期侧重点也可能有所不同，随着不同形势的变化可能也在不断调整。相应的，在不同时期，理论化的侧重点也发生了变化。“一带一路”的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会随着体系变革的发展可能性走向不同的路径。我们需要在理论的精致、逻辑自洽和解释现实的准确性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我们可能需要采取折中主义的路径。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说，折中主义不是进行精确的理论研究的一条道路，但有些时候却是唯一可行的道路。^①

总之，“一带一路”的理论化是非常有挑战的工作。我们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那会导致食洋不化，还会产生严重的误导。我们需要增强理论勇气和理论志气，承担起理论创新的担当。

参考文献：

1. 张辉：《全球价值双环流架构下的“一带一路”倡议》，《经济科学》，2015年第3期。
2. 张辉、易天、唐毓璇：《一带一路：全球价值双环流研究》，《经济科学》，2017年第3期。

^①[美]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页。

3. 黄先海、余晓：《以“一带一路”建设重塑全球价值链》，《经济学家》，2017 年第 3 期。
4. 刘志彪、吴福象：《“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价值链的双重嵌入》，《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8 期。
5. 傅梦孜：《“一带一路”倡议的三个理论视角》，《现代国际关系》，2018 年 12 期。
6. 黄益平：《中国经济外交新战略下的“一带一路”》，《国际经济评论》，2015 年第 1 期。
7. 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6 期。
8. 刘卫东、Michael Dunford、高蒞阳：《“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建构——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包容性全球化》，《地理科学进展》，2017 年第 11 期。
9. 刘卫东：《“一带一路”：引领包容性全球化》，《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 年第 4 期。
10. 李向阳：《“一带一路”的研究现状评估》，《经济学动态》，2019 年第 12 期。
11. 李冰、谢来辉：《西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国际合作倡议：进展、特征及影响》，《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5 期。
12. Summers, T., China's "New Silk Road": Subnational Regions and Networks of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7 (9), 2016.
13. Jones, L. and Jinhan, Z., Understand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eyond Grand Strategy to a State Transformation Analysi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0 (8), 2019.
14. Ho, S., Infrastructure and Chinese Pow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6 (6), November 2020.
15. Callahan, W. A.,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New Eurasian Order, *Norweg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6.
16. Callahan, W. A., China's "Asia Drea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New Regional Order,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1 (3), 2016.
17. Miller, T., China's Asian Dream: Empire Building along the New Silk Road, Zed Books, 2017.
18. Zhao, S., China's Belt - Road Initiative as the Signature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Diplomacy: Easier Said Than Don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9 (123), 2020.
19. Beeson, M., Geo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RI and China's Evolving Grand Strateg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Vol. 6 (3), 2018.
20. Leverett, F. and Wu, B., The New Silk Road and China's Evolving Grand Strategy, *The China Journal*, Vol. 77 (1), 2017.
21. Nordin, A. H. M. and Weissmann, M., Will Trump Make China Great Aga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2), 2018.
22. Bishop, M. L. and Payne, A., The Political Economies of Different Globalizations: Theorizing Re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s*, Vol. 18 (1), 2021.
23. Keith, R. C. (ed.), *China as a Rising World Power and its Response to "Globalization"*, Routledge, 2005.
24. Wang, H., Selective Reshaping: China's Paradigm Shift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23 (3), 2020.
25. Helleiner, E., The Life and Times of Embedded Liberalism: Legacies and Innovations since Bretton Wood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6 (6), 2019.
26. Rodrik, D., Globalization's Wrong Turn, And How It Hurt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July/ August 2019.

责任编辑：郭霞

Security Initiative and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and promote synergy with China in the new era to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in the next ten years,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should be re-planned at the macro, meso and micro levels, so as to effectively achieve the firmness of principles and the flexibility of strategie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ree Commons” principle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it will steadily and prudently carry out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nd promote new results in “small but beautiful” projects; strengthen the docking with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gradually form a development paradigm that places equal emphasis on projects and rule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healthy, green and innovative Silk Road, continuously expand and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cooperation in new fields and new tracks, adhere to quality first, safety first, and high-quality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a stable and far-reaching manner.

(5) Thre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Xie Laihui

The “Belt and Road”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China’s all-round opening up in the new era, a top-level design of economic diplomacy, and a practical platform for exploring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he past decade,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carried out a lot of explorations and attempts on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issues related to the “Belt and Road”. Based on the disciplinary tradi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understanding the “Belt and Road”. It is found that the main path research on the theoriz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s largely based on three perspectives; wealth, state power and social purpose. Although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elieves that wealth, state power, and social purpose are the three basic elements of the discipline, it emphasi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According to this understanding,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the future should break the isolation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achieve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compromise.

(6)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logic

Huang Yutao, Ren L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so far, but it also faces new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Promot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has important strategic value, but what kind of perspective to guid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has not been fully explore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rection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practice turn” in the frontier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mphasizing that practice is an important wa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so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path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focusing on specific experience. Different from the representational knowledge generalization that directly summarizes abstractly,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construction under the practical logic pays attention to the behavioral norms of soft constraints, the differentiated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ubject, and the direct experience of front-line participants. Guided by this,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demand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developed European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and feasibility,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existing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s. Cooperation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take the construction of park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give play to the role of enterprises, cooperation with developed European countries should make use of their financial market advantage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 networks, and cooperate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hould adhere to the United Nations as the center,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international customs and rules in a timely manner.

(7) Problems, idea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Eurasian Bridge Economic Corridor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Hou Shengdong, Wu Fan, Ma Qingbin

The New Eurasian Bridge Economic Corridor spans the Eurasian continent and connects the Pacific and Atlantic ocean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and high-quality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recent years, remarkable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Eurasian Bridge Economic Corridor,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conomic cooperation mechanisms, positive progr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RAILWAY Express, steady progress in land-sea combined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network, and obvious progress in multilateral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Eurasian Land Bridge Economic Corridor is still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increasing external uncertainties i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of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and the low level of soft connectivity such as rules,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It is suggested that on the basis of promoting political mutual trust among countries along the corridor, optimizing the mode of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promoting the better integration of the corridor into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flow of key elements, more top-level planning and policy docking mechanisms should be explored,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ulti-level connectivity should be acceler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pen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should be promoted, and better integr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in economic corridor cooperation.

(8) The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ervice trade empowering common prosperity—Take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Xia Jiechang, Wang Yueying, Li Luanhao

Service trade is the main field and key starting point of opening up, and Zhejiang Province is the forefront and important window for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building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in China, providing provincial cases and reference standard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ervice trad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on prosperity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ervice trade, 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the role of service trad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on prosperity society, avoids the adverse effects of service